



“城市英雄”之一

今天花价多少

何 芬

编者按：

《城市英雄》独立成篇又互相关联,分为四个篇章,分别为《今天花价多少》《老板娘》《友谊小船》《窗外》,现分篇刊登。

“今天花价多少?”我将我在花店后面的花房里挑好的一打“戴安娜”，放到收银台。

收银的人把头抬一下，看看我拿的是什么花，然后低头翻台面上的记账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当天到店的鲜花的进货价。她查到那一页，抬头说：“今天戴安娜是45块。”

我付账时，一旁正在插花的花艺师放下手中的活计，用那只戴着布手套的手抓住我买的那束粉玫瑰。“要打刺吗?”她动手前不忘问问我。得到我“不用”的回答后，她扯出一张透明玻璃纸准备打包。

“等下。”另一个比她年长点的花艺师示意她停下，“上次不是还有那种外文报纸图案的包装纸吗?去拿，用那个外面再包一层就不扎手了。而且配单色花,拿着也好看。”

于是，两个女人窸窣窣窣拆开原包装的白色吸水纸，一层玻璃纸再一层硬包装纸地将玫瑰花束包好，再随手给花束扎上一根麻绳，然后满心欢喜地交到我手里。我临出门时，他们还不忘嘱咐：“玻璃纸里面蓄了点水，你不急着回家的话，还足够保鲜。”

我退出门，一只手拿着我的花，笑着点头感谢，然后，慢慢走路回家。

等红灯时，换了只手拎花，突然有了一种身在云南、像买菜一样买花的错觉。

我没有去过云南。我只在十五六岁时，曾听我最小的姑姑说过她十六七岁时对云南昆明的向往：四季如春，气候宜人，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城市。云南大学是姑姑她那个年代的人心目中的双一流高校。但高考失利，被老师料定“云南大学可以闭着眼睛上”的姑姑只考上了衡阳师专。

我是在姑姑姑父乔迁新居后的那个暑假，与姑姑打地铺睡在她新房的木地板上，听姑姑聊起这些的。

记得姑姑姑父乔迁家宴上，爸爸给他们敬酒：“祝贺你们，白手起家，在30岁的时候就有了一套靠近医院、学校，位于市中心的100平方米的房子。”爸爸回头看看我妈妈，继续对姑姑姑父说：“我和你嫂嫂30岁的时候，还在两地分居吧……你们啊，比我们要强。”“我们，都还是以哥哥嫂嫂为我们的榜样。”文质彬彬、驾着一副金边眼镜的姑父接过爸爸的话，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小窝窝。

回想起敬酒的场景，我问姑姑，你跟姑父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?

莫非，你们小时候的事情，你不记得了?姑姑惊讶地睁大眼睛。

小时候?小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会不记得?听妈妈说，那时姑姑要去实习，已经参加工作的姑父过来送一块手表，那是我们家人第一次见到姑父。那时姑父来见姑姑，姑姑不是带着我，就是带着我弟弟，要么就是把两个人都带着。

吃的什么、玩的什么，我们都忘记了。只记得姑父为了哄我们，也不知给我们买了多少米老鼠唐老鸭的不干贴。跟姑父玩熟了，我就扒拉着姑父眼睛瞧，问：“唐叔叔，你眼皮上怎么有个红色的点点啊?”姑父一笑，两颊笑出两个小窝窝，他告诉我：“我这是个小灯泡。到了晚上的时候，我的小灯泡就亮起来，不要开灯也可以看书。”

呵呵，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其实我和弟弟才是姑姑姑父的小电灯泡。

姑姑和姑父大概是改革开放后最先懂得浪漫的那一拨人中的一员。

记得我七八岁时，晴朗的秋冬之际，跟着姑姑外语系的同学去野餐，我把佐餐酒当作汽水喝，喝得歪倒在铺着野餐布的茶树林地。迷

那根线

邹贤中

2012年,在生意场上沉浮半年的我,终于在那个秋天选择将店铺关门。小店每月入不敷出,如果再撑下去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倒闭,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

小店关门后,我算了一笔账,当兵多年的退伍费全在生意场上打了水漂。想起做生意前父亲的劝告,我却执意踏入商海,最终惨败,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情绪涌上心头。一味沉浸在失败中也不是办法,人要吃饭,要生存,万般无奈之下,我选择到一家小工厂落脚。宿舍无人的时候,夜半辗转反侧的时候,我独自舔着伤口。秋风渐浓,随后冬风来了,很快就临近年关。

知道我经商失败后,父亲也多次打来电话安慰我,特别是年前,多次来电叫我回家过年。想起父亲之前的劝告和自己的惨败,我难免觉得近乡情更怯。那个年,我独自在深圳过的。过年那天,父亲又打来电话,听着电话里热闹的鞭炮声,我愈发孤独。父亲问我:“还记得小时候放风筝的情景吗?”父亲怎么说到了小时候?而且还提到了放风筝?我不明所以。

放下电话,我细细品味,才在记忆的长河中将一些碎片打捞起来,拼凑成儿时的一些画面。那是一个赶集日,我看到有人在卖风筝,就央求父亲买了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风筝。阳光明媚的三月,父亲带我去放风筝。在一块绿茵似锦的草地上,我拿着风筝的提线,逆风向前奔跑,一边跑一边观察风筝飞升的状况,风力强劲,风筝不断向上爬升,我停下来,慢慢放线。而当风力不继时,我则快速向后收线,给予人工的加风。

风筝已经稳稳地升在空中了。父亲走了过来,对我表示赞许。我指着风筝线对父亲说:“这根线束缚了风筝,要是没有这根线,没准风筝可以飞到天涯海角去。”父亲摇了摇头:“没有线的风筝是飞不远的。”我不信,父亲说:“你看。”只见他剪断了我手上的那根线。果不其然,没有了线的牵引,在风力的作用下,风筝迅速飘远,只是时间不长,很快就一头栽了下来。

昔年的往事经过父亲一提醒,又历历在目了。游子是风筝,而家就是拽住风筝的那根线,难道父亲怕我成为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吗?我开始为自己的任性感到后悔。没想到的是,在年后的三月,父亲来到了深圳。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到深圳的父亲,竟然带来了一只色彩斑斓的风筝。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思。一个周末,在莲花山公园恣意汪洋的绿草地上,已经长大成人的我又和父亲放起了风筝。风筝越飞越高,我紧紧地拽住那根线,生怕风筝在短暂地远走高飞后一头栽倒在地之上。

放完风筝后,父亲没有跟我讲大道理,一些事情和道理我也心知肚明。后来的我,不管工作和生活多么不如意,都会第一时间给家人报平安。我知道,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,生怕风筝挣脱了线的束缚,从而走上歧途。

代父亲交党费

刘
先
卫

父亲庄严地将一本新党员手册和党费款递给我，叮嘱我到镇党组织办去交纳党费。端午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,我代父亲交纳了全年12个月党费156元,收费人员收好现金,郑重其事地在党员手册上作好记录,并盖上了镇组织委员会的大红印章，我如释重负算是完成了一项光荣而又特别的任务。

今年已有82岁高龄的父亲,是一位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。翻开父亲的党员手册,可以详细了解到父亲的基本情况: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入粮食部门工作,1959年反右倾运动扩大化受到错误处理,1982年落实政策复职在人民公社先后当任秘书、会计、组织委员,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在右倾运动中遭受冤屈的父亲,为了恢复工作历经漫长的等待,1982年与舅父一道风尘仆仆赶去长沙,见到了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。书记一纸“按政策落实”的亲笔批示终于使父亲得以平反昭雪。此后,父亲再没有向组织提出过生活和工作上的要求,尽管五个子女解决城镇户口后又全部失业。

我代父亲交纳党费,这是因为父亲1999年退休后,叶落归根从镇上回到了山区老家。老家离镇政府虽然只有十五华里地,若没按时坐上农村公交车就要租乘摩托车,父亲年老体迈行动迟缓,参加行政支部党组织生活也是力不从心,所以老人的安全问题是全家最大的担心,我们也会再三嘱咐老人家不要独自上街购物和领取工资。2017年年底,父亲患前列腺在医院做了一次麻醉手术后,记忆力大不如前,交党费的差使自然被我应承了下来。

先前那本旧党员手册陪伴父亲已有三十年之久，一个胶壳本包装的袖珍小册子如今变成了暗红色，小册子随着历年党费交纳完成使命被父亲上锁保管起来。今年初,在父亲一而三再而三的催促下,我从镇组织委员手中领取了一本新册子。鲜红的新党员手册印着镰刀,封面下方有“中共衡阳市委组织部制”字样,内页目录分为入党誓词、中国共产党章程、三会一课制度、支部主题党日制度、交纳党费说明、党费交纳记录等。册子还收录了2017年10月2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过的党章内容。

对党一直心怀感恩的父亲,辛勤工作四十余年,获得过荣誉证书一大堆,也就是一个低收入的无名小公务员而已。虽然,我们家没有谁在政府单位谋份公差,但父亲不循私情、不图名利的言传身教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,教会了我们兄妹用自律、节俭、博爱和包容去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,过着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。